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 宗教史卷

本卷主编 姚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 宗教史卷

本卷主编 姚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宗教史卷/伊沛霞,姚平  
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325-6429-3

I. ①当… ②宗… II. ①伊… ②姚… III. ①汉学—研  
究—世界—文集 ②宗教史—中国—文集 IV. ①K207.8-53  
②B92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9919号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宗教史卷

姚平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5 字数 400,000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6429-3

K·1576 定价:4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系列由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China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赞助

# 总序

##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趋向

伊沛霞(Patricia Ebrey)

姚平译

1966年是中国“文革”肇始之年；在美国，大学校园反越战运动也正进入初期阶段。对我来说，1966则是我第一次选修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年份。在那段时光里，中国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仍被普遍地称为“红色中国”(Red China)。虽然我的老师中有的曾在30年代和40年代居住在中国，但我很明白我不可能有去中国的机会。

在1966年，有关中国研究的英语著作已经相当可观。从19世纪起，不少学者在辛勤多年的基础上编成中英字典、翻译中国经典著作和主要文学作品。在进入20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中国研究的主导人物是欧洲人，如理雅各(James Legge)、戴闻达(J. J. L. Duyvendak)、卫德明(Helmut Wilhelm)、威利(Arthur Waley)、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等。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时，已有十几份学术杂志定期刊登中国史论文，如《亚洲专刊》(*Asia Major*)、《通报》(*T'oung Pao*)、《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以及《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等。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也正在逐渐发展，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设有中国史课。1962年贺凯(Charles Hucker)编辑出版了《中国：评论性目录》(*Chin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书中所列书籍论文已达二千余种。当时，有关中国的书

籍颇受欢迎,而我的老师们则一致认为驳倒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 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事关重大。魏复古著作的挑战对象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韦伯有关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他提出,理解官僚政治社会的关键是灌溉型农业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有召集大量劳力、建造并维持水利工程能力的强大政权。当时最受欢迎的反魏复古论点的著作是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出版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1957年)及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编《儒学表现》(*Confucianism in Action*, 1959年)等。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迅速壮大,而且其发展过程还反射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变化、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变化以及学者成份的变化。本系列各卷编辑将在各分卷前言中讨论相关课题研究中的变化(如妇女史研究的兴起和对宗教课题的渐趋关注等),但我想在总序中概括一下这四十年中影响着中国史众多课题研究的趋向当不无益处。

不言而喻,对历史学家来说,导致他们研究中国的原因往往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在我1966年至1971年间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修中国史课时,我的教授们选择研究中国的原因颇为特别。许多人(men 那时的教授们几乎全是男性)在二战或朝鲜战争中在美国军队受东亚语言训练,有的参与情报活动,还有一些则曾在美军驻日期间在日本工作。这一代的教授一般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全球态势。因此,在越战之类不少议题上教授和学生们的观点往往有极大分歧。

与这些学者年龄相当的美籍华人则组成了当时美国最领先的中国史课目的第二批教授。他们中有些是在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来美国读博士并在1949年后留在美国的,还有些是离开大陆到台湾,然后再来美国留学的。这批学者中不仅有传统的人文学家,还有不少是深切关心中国现状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借助西方理论和观念来探

究中国的过去。这类学者包括萧公权、杨联升、瞿同祖、张仲礼、刘子健、许倬云、何炳棣等，他们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化以及阶级结构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 20 世纪的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大学中仍有一批教授是在二战前就与中国有关连的。他们中有些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在中国长大。比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早已退休，但他每天来校，在他的办公室里编写《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他儿时在北京居住，曾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其他一些教授则在上世纪 20 年代或 30 年代期间萌生了研究中国的兴趣。当时美国能提供高级中文和中国史课的大学屈指可数，而对美国人来说，在中国住上几年、请私人教师强化自己的汉学功底花费并不大。

我想我自己这一代中国史学者可以被称为“越战代”（Vietnam War generation）或“国防外语奖学金代”（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 generation）<sup>①</sup>。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政府奖学金机会的增加，尤其是当这类研究生奖学金意味着可以推迟服兵役时，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中国史的学生数骤然上升。当然，越战的影响并不只在于给男生一个留在学校逃避征兵的机会，不少反对越战的青年视亚洲研究为真正改变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但是“越战代”历史学家不能去中国大陆做博士论文研究，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其他亚洲地区：研究当代中国的博士生大多去香港；以中文流利为首要目标的或希望在“传统化”中国做实地考察的往往去台湾；也有一些博士生选择去日本，师从当时成就卓著的日本中国史专家。

70 年代之际，美国历史学家的就业机会直线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人口模式。70 年代之前的二十年中，美国大学竭力扩大师资以适应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ers），到了 70 年代，大学各系多

---

① 1958 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旨在加强大学的跨文化课程。

已人员齐备,而打算在几年内退休的教授又不多,所以我们这一代中有不少顶尖的研究生毕业后去金融界、商业界或政府部门工作,他们不愿意或没有经济能力为一个合适的职位等上好几年。最后留在历史学界的往往都经受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但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坚信唯有学术界才是他们的用武之地。

这套翻译系列中的许多文章出自越战代/国防外语奖学金代学者之手,但更多的则是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新一代可以统称为“中国开放代”(Opening to China generation)。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研究生去中国学习及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终于成了一种可能。虽然在初期阶段双方都带有一点试探心理,但是80年代期间,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变迁。至80年代末,绝大多数重要的博士点在招收中国学生,而这些博士点所收的美国学生又大多在中国生活过几年,或是教英语,或是在一些国际组织工作。因此,在博士课程中,语言训练已不再举足轻重。

中国的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史研究者的身份组合,而且它还对中国史研究的课题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逐渐扩大:档案馆愈来愈愿意让外国研究者使用档案资料;政府机构也逐渐接受面谈、民意调查及驻地考察等要求。所有这些使学者们更容易研究那些依赖于文献、珍本和考古材料的课题。这些变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进研究生院的博士生论文的课题,而且前一代学者也迅速地利用这些新机会来修正他们的研究项目。由于去日本留学的博士生越来越少,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普遍下降,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相应上升。

上世纪80年代大量中国研究生来美国时,正是美国学界历史研究理论框架的转型阶段。在60年代期间,社会史研究占绝对优势。许多社会历史学家非常钦佩法国年鉴派的理论,他们探索能了解贵族层以下的平民百姓生活的研究方法,并力图发掘以计量证明的史料。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何炳棣在1962年发表的《明清社会史论》(*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此书以进士名册为据,考察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它提出,明清时期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至80年代,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已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选择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课题。同时,在历史学家选择和设计研究课题时,他们往往从理论(特别是文学和人类学理论)框架着手。从中国来的研究生并不需要像美国研究生那样花大量的时间来对付史料阅读课,因此,他们往往选修一些与中国或亚洲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课。从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研究的论著渐渐倾向于申明它们的理论性判断和主张。

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大趋向之外,中国研究领域本身也有不少动态性变化。最值得一提的是学术讨论会及讨论会论文集的巨大作用。一些著名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福特[Ford]、梅隆[Mellon]基金会等)认为中国研究领域需要额外的资助;而从1951年起,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在以后取名为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赞助下,积极鼓励学者们合作研究一些高优先性课题。当时有不少基金会赞助的中国史专题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持续几天,并以详细评点个人论文为主要形式。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类讨论会,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杨联升,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 Mote),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斯坦福大学的芮沃寿、倪德卫,加大伯克莱分校的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和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等。此外,一些美国以外的著名学者也参与了这些讨论会,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傅海波(Herbert Franke)、王赓武等。

这种学者间合作创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不久,美国学术团体(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中的中国文明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中的当代中国委员会(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接受

这一资助学术讨论会的传统<sup>①</sup>，从而保持了讨论会对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在70年代的十年中，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册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虽然这些论文集并不以历史为中心，但其内容多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如妇女研究、城市研究、宗教研究、经济组织研究等。此外，每册论文集中至少包括了一篇历史研究的文章。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专题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单独的时间段，它应该是跨学科的。在这套丛书中，《中国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1975年)和《明清时期的城市》<sup>②</sup>(*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7年)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尤其重大。从1982年起，中国联合委员会赞助的讨论会论文集陆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论文集是该社中国研究丛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加大出版社的这套丛书已有28册，我们这套翻译丛书中有两篇文章来自加大中国研究丛书中最有影响的论文集之一——《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85年)。

参加这些委员会或各大学赞助的学术讨论会成为中国史学者组成学术圈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讨论会之外，他们经常切磋交流，相互阅读、评点手稿。在历史学界的其他领域里，讨论会论文集的文章多被视为无足轻重，但在中国史领域中，学者们往往将自己最出色的论文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有益的反馈，而且还因为文章被收入这类论文集确保了他们有大量的读者。我们这套丛书中有好几篇文章最初就是在这类论文集中发表的。

中国史领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者们与中国的历史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中国专家关系密切。这一方面是由汉学传统决定的：早几代的历史学家往往花很长时间学中文，他们与研究中国文学、政治、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学生同进共出课堂多年。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特点：这个亚洲学中最有权威的学术团体每年召开年

---

① 这两个组织在80年代早期合并成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② 或译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会,使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机会与其他领域的中国学专家相聚一堂,并促使学者们去组织一些跨学科研究的讨论小组。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 60 年代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模式的鼓励。“区域研究”的根本信条是:仅仅掌握某种语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一个打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方法论的学者必须在懂得语言之外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美国人(或中国人之外的其他种族的人)来说,这种全面训练的最快途径是选修中国研究课程。不过,至 90 年代,“区域研究”模式受到了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猛烈抨击。许多院系不再愿意招聘“中国政治学家”(China political scientist)或“日本经济学家”(Japan economist)。区域研究专家往往在系里低人一等。大多数在社会科学院系教书的区域研究教授教的是公共课,他们每年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教有关中国的课程。所幸的是,中国史教授们大多躲过了这场对区域研究专家的攻击。在历史系,教授们专治一个区域和一个时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原始资料及其相关知识。因此,自 90 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专家成了大多数区域研究课程的中坚力量。

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是否比其他历史领域发展的更快?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尤其是考虑到四十年以来这一领域所得到的额外的研究基金。至少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在成倍增长。我在 1969—1970 年期间准备我的博士资格考试时,学校对我的要求是熟悉过去四、五十年中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史的论著。当时复印机还没有普及,我坐在图书馆里翻遍所有的重要期刊,寻找有关历史的文章,做笔记,居然也还应付过来了。时至今日,英语的历史期刊数不胜数,有些刊物还是中国断代史方面的,如《早期中国》(*Early China*)和《明清史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等(这两份期刊在我们这套翻译系列中占很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专题著作和讨论会论文集的出版也更趋频繁。今天的中国史研究生在准备资格考试时很少有试图看遍有关某一个朝代的英语著作的。所幸的是,综合性著作进展尚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最重要的出版项

日是集体合作编写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它不仅是一套详尽的中国政治史,而且还分析性地介绍了有关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当今中国史研究仍然受制于整个学术界和大环境的影响。从这套丛书的各卷目录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中吸引着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课题也正是中国史学家们所十分关注的。我想,对中国史研究中英语研究成果的趋向的回顾以及这套丛书的编辑促使我们去思考许多问题,如:身份标识(identities)及其形成过程和形成原因;文化、民族、地区的界域,这些界域的重要性和它们的相互跨越性;以及本土视角(local perspectives)等。与此同时,中国的形势仍然影响着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二十年以来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不仅给我们在中国做研究创造了更舒适的条件,而且还造成了大学中中国史课需求量的增加,从而间接地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更多在大学供职的机会,为研究性大学中国史博士点设立的扩大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

# 前 言

姚 平

中国宗教史研究是西方中国史研究中最成熟的领域之一,它的源头在欧洲。长期以来,欧洲,尤其是法国,是西方最早开展道教研究和佛教研究的地方。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的中国宗教史研究迅速发展并逐渐取代欧洲而成为西方中国宗教史研究的中心,许多美国大学逐渐建立起道教、佛教研究中心,开设中国宗教史课程。此外,70年代后的宗教史研究更注重通过宗教现象来考察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特质及其变迁,在研究课题上也更趋多元化、细分化。介绍西方中国宗教史研究最全的资料是汤普森(Laurence G. Thompson)编撰的中国宗教研究西文文献系列。此系列首卷出版于1976年,题为《中国宗教研究:1970年以前英、法、德语文献综合分类目录》<sup>①</sup>。1985年,汤普森在原书的基础上加入了1970年至1980年间的出版物,并将书名改为《西语中的中国宗教研究:1980年以前英、法、德语文献综合分类目录》<sup>②</sup>;1993年出续集,收集了1981—1990年间的出版物,再改名

---

① 汤普森,《中国宗教研究:1970年以前英、法、德语文献综合分类目录》(*Studies of Chinese Religion: A Comprehensive and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through 1970*),安西诺(Encino),加利福尼亚:迪根森(Dickenson)出版社,1976年。

② 汤普森,《西语中的中国宗教研究:1980年以前英、法、德语文献综合分类目录》(*Chinese Religion in Western Language: A Comprehensive and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Through 1980*),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85年。

为《中国宗教西语文献,1981年至1990年》<sup>①</sup>;1998年出《中国宗教西语文献第三卷,1991年至1995年》<sup>②</sup>;2002年出《中国宗教西语文献第四卷,1996年至2000年》<sup>③</sup>。《亚洲研究杂志》1995年第2期(总54卷)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现状专辑,其中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等合撰的《前言》(Introduction)<sup>④</sup>、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的《道教》<sup>⑤</sup>、泰勒(Rodney Taylor)和奥巴克莱(Gary Arbuckle)的《儒教》<sup>⑥</sup>、马克瑞(John R. Mcrae)的《佛教》<sup>⑦</sup>,以及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的《民间宗教》<sup>⑧</sup>等文对西方学者的研究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在编辑西文文献系列的同时,汤普森又撰写了《中国宗教导论》,此书在1969年初版,以后又几次修订再版<sup>⑨</sup>。在《中国宗教导论》前言中,汤普森主张以单数的形式(Chinese religion,而不是Chinese religions)来形容中国宗教。他认为,中国宗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征”(manifest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已经深深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各种宗教间的区别和对立只表现在上层的、专职的宗教体系中<sup>⑩</sup>。这个观点与许理和(Erich Zürcher)关于中

① 汤普森,《中国宗教西语文献,1981年至1990年》(*Chinese Religion: 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 1981 through 1990*),美国亚洲研究学会,1993年。

② 汤普森,《中国宗教西语文献第三卷,1991年至1995年》(*Chinese Religions: 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 vol. 3: 1991 through 1995*),美国亚洲研究学会,1998年。

③ 汤普森,《中国宗教西语文献第四卷,1996年至2000年》(*Chinese Religions: 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 vol. 4: 1996 through 2000*),美国亚洲研究学会,2002年。

④ 《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4卷(1995年)第2期,第314-321页。

⑤ 同上,第322-346页。

⑥ 同上,第347-354页。

⑦ 同上,第354-371页。

⑧ 同上,第378-395页。

⑨ 汤普森,《中国宗教导论》(*Chinese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迪根森出版社,1969年;汤普森,《中国宗教导论》第二版,迪根森出版社,1975年;《中国宗教导论》第三版,贝尔芒特(Belmont),加利福尼亚:瓦兹沃施(Wadsworth)出版社,1979年;《中国宗教导论》第四版,瓦兹沃施出版社,1989年;《中国宗教导论》第五版,瓦兹沃施出版社,1996年。

⑩ 《中国宗教导论》第五版,瓦兹沃施出版社,1996年,第1页。

国宗教的金字塔模式非常接近<sup>①</sup>。许理和认为,儒教、佛教、道教是三座共享底座的金字塔塔尖。塔尖越高,它们之间的差异就越明显,越局限在一个职业的、精英群体中。就底座而言,我们很难分辨它是佛教、道教还是儒家。他们的观点在西方中国宗教史研究中颇有代表性。可以说,西方中国宗教史研究有两个重头,一方面,学者们非常注重某一宗教体系的渊源和发展,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各种宗教的相互融合,以及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近年来,不少西方学者还试图探讨“金字塔尖”——各种宗教的核心观念——中的包容性,他们对道佛两教的互补和混杂尤其感兴趣。比如,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在他的新作《祖先与焦虑》<sup>②</sup>中强调,佛教的冥间与再世的概念对3-6世纪间道教冥间概念有极大的影响。最近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在《佛教与道教面对面:中国中世纪时期宗教经籍、仪式和偶像的交流》<sup>③</sup>一书中更为全面地考察了道佛两教是如何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并重新自我更新、自我包装的。

为叙述方便起见,本章将对道教、佛教作分别讨论(关于儒教的研究则将在本系列的《思想文化史卷》中作介绍),本章的第三部分介绍本书所收的十篇论文,并讨论传统的道教与佛教研究之外的课题,如神话研究、共同宗教、宗教研究的方法论等。

## 一、道教研究

西方的道教研究起源于法国,最早的《老子》译本可以追溯到1820年。不过,正如巴瑞特(T. H. Barrett)指出的:“长期以来,西方人

① 见许理和(Erich Zürcher),《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通报》第65卷,第1-3期(1980年),第146页。

② 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祖先与焦虑》(Ancestors and Anxiety: Daoism and the Birth of Rebirth in Chin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 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佛教与道教面对面:中国中世纪时期宗教经籍、仪式和偶像的交流》(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Scripture, Ritual, and Iconographic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8年。

或是拒绝、蔑视道教传统,或是因错误的原因而崇敬它。”这种对道教的误解甚至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sup>①</sup>。有关西方的道教研究,尤其是1950年以后的道教研究,石秀娜(Anna Seidel)曾发表过非常详细的介绍和评估。这篇题为《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sup>②</sup>的著作已被两次译成中文,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sup>③</sup>。中华书局版的译者之一吕鹏志在“译者前言”中对石秀娜本人以及《编年史》的编排结构、重要观点及其贡献有详细阐述,因此本文将不再赘述<sup>④</sup>。此外,陈耀庭、郑天星、曾传辉等学者也曾分别撰文介绍和评估西方学者有关道教的研究,其中曾传辉《2000—2007年美国道教研究成果评介》一文对美国道教研究的最新出版物有精辟的概括和评估<sup>⑤</sup>。读者可以从以上这些作者的论著中详尽地了解到西方道教研究的历史、主要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本文因此将只对西方道教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其所反映的趋向作一些分析。

近年来道教研究的最大成果无疑是两部大型工具书的出版。第一部是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和傅飞岚主编、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此书分别介绍了明版《道藏》中近一千五百种道教经典(以及敦煌文献中的道教书籍)的起源、作者、内容

① 巴瑞特(T. H. Barrett),《序言》(Foreword),收于《道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若特莱杰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② 石秀娜(Anna Seidel),《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载法国,《远东亚洲学刊》(*Cahiers d' Extrême-Asie*),第5卷(1989—1990年),第223—347页。

③ [法]安娜·塞德尔著,蒋见元、刘凌译,《西方道教研究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和中华书局[法]索安著,吕鹏志、陈平等译,《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2002年。(安娜·塞德尔、索安均为石秀娜[Anna Seidel],不同版本,译名不同——编者注。)

④ 吕鹏志,《译者前言》,《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1—19页。

⑤ 见陈耀庭,《道教在海外》第二编《海外学界对道教的研究》中第五章《法国的道教研究》,第六章《欧美和其他国家的道教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2—198页、199—259页;郑天星,《国际汉学中的道教研究》,收于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第三部分第二章,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71—517页(第518—538页讨论了日本和韩国的道教研究);曾传辉,《2000—2007年美国道教研究成果评介》,《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2期,第54—57页。



大要、传授历史以及有关研究等,此外,第3卷中还列出参与编写的学者的介绍。可以说,《道藏通考》的出版本身就是西方道教研究成就卓著的一个证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道藏通考》前言中施舟人强调了西方道教研究的一个新的立足点。他指出,以往的一个“汉学教条”(sinological dogma)是区分“道家”(Taoist school)和“道教”(Taoist religion),但是,这种区别显然是错误的。明版《道藏》的编排并没有道家著作和道教著作之分,可见这种区别并不存在或起源于道教(Taoism)传统中<sup>①</sup>。他主张现代学者应当遵循《道藏》的原则,将前期的道家(教)著作与后期的(东汉以后)道教著作都看成是中国道教的总体内容的组成部分,因为,“道教逐渐演变并以新的形态出现是非常自然的”<sup>②</sup>。

第二部工具书是2008年由若特莱杰(Routledge)出版社出版、普里伽迪奥(Fabrizio Pregadio)主编的《道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此书分两卷,共一千五百多页,收入条目一千七百余,分别介绍道教历史、教派渊源及传承、著名道教人物、著名道教经籍、重要道教词汇、道教众神、道教建筑和圣地等。此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与这些课题有关的参考资料,而且还反映了这些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孔丽维(Livia Kohn)所编的《道教手册》也是一本非常受欢迎的参考书<sup>③</sup>。

西方道教研究的另一个新发展是重要道教经典的翻译和研究。这一类体裁的著作中的前言往往是一篇出色的研究性论文,介绍该经典的来龙去脉、它在道教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它所反映的道教观。一些学术出版社还有计划地出版了道教经典系列,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从1997年起出版“道教经典系列”(Daoist Classics Series),至今已出版了三种。柏夷的《早期道教经典》(*Early Daoist Scriptures*,

① 见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傅飞岚(Fransiscus Verellen),《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② 同上,第7页。

③ 孔丽维(Livia Kohn),《道教手册》(*Daoist Handbook*),布瑞尔(Brill)出版社,2005年。